

2017 年终专稿

编者按

不知不觉间,2017年即将迎来尾声。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是值得纪念的。在这一年,我们迎来了恢复高考的40周年;在这一年,“双一流”名单正式公布,在这一年,党的“十九大”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勾勒出壮美的未来……

我眼中的2017年

校长篇



浙江科技学院院长 叶高翔



安徽农业大学校长 程备久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徐飞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 谭天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陆靖



苏州职业大学校长 曹毓民

《中国科学报》:回顾2017年,您觉得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谭天伟:对于北京化工大学而言,2017年最骄傲的事情无疑是昌平校区的启用。新校区的建设与启用,凝聚了几代北化人的期待与情感,实现了北化人多年的夙愿,在北化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徐飞:作为一名校长,最值得骄傲的当然是学生的成长、成才,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学生出彩。2017年11月,西南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周祚万的博士生杨倩,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子刊《自然-材料》上发表文章,这是继今年10月她在《科学》上合作发表文章之后的又一原创性成果。

程备久:大学是学生、学者和学术的大学。作为校长,我感到最大的收获在于学生和教师的发展。今年,我校一学生团队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总决赛中荣获特等奖;2名教师分别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百千万人才工程”项目;学校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牵头主持了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同时还承担了16项课题,在创新发展时代主旋律中唱响了地方高校的“好声音”。

陆靖:2017年,有许多令人兴奋和骄傲的事情,特别是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更是为我们如何进一步落实国家各级部门“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方向。这一年,学校也发生了很多大事,我们接受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办学条件和水平获得了专家的一致认可;学校学科首次参加评估,学科内涵建设水平不断提升,成为博士建设单位;学校用一年的时间在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等学校“十三五”规划重点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通识课程教育体系基本形成,这些为学校内涵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曹毓民:2017年,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强、回味最多的是自己直接参与了“青春与价值对话”活动。这一活动是苏州职业大学联合其他单位,为苏大学生举办的首场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我全程参加了这次对话活动,在活动中零距离倾听了在校大学生的心声,用我自己的青春记忆和成长经历,与学生们面对面谈心、交心。作为一名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能与莘莘学子们同频共振、携手共进,努力培养和造就有情怀、有理想的当代工匠,这就是最值得骄傲的事业追求。

《中国科学报》:回顾2017年,您觉得哪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强?

谭天伟:感觉时间太短,一年过得太快,很多计划内的事情没有完成已经到了年底。其中最大的遗憾是,学校为切实解决教师实际困难而努力推进的几件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达到预期进度,比如住房问题、子女入托问题。另外,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的进度与计划有差距。

徐飞:2017年最大的遗憾,一是一些民生问题,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子女入托、上中小学等后顾之忧未能很好解决。二是原本计划今年为学生作三场报告和讲座,如今只完成了两场。现在离年底还有十多天,我想抓紧再讲一场,但考虑到学生准备期末考试时间紧张,很可能只能到2018年再弥补。

程备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对农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将紧扣人才培养根本任务,着力在完善协同育人机制上下功夫,着力在培养增

强大学生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以及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上下功夫,努力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一懂两爱”的新时代高素质农业人才。

叶高翔:目前最需要加强的是提高教育质量。目前我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力度还需要加强;师资力量还相对较弱,引进人才和学科建设面对的压力较大。虽然我校的国际化数量有较大提升,但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

曹毓民:2017年,苏州职业大学先后成立了中巴经济走廊文化交流中心和国际学院,并首次对外招收了国际留学生。虽然学校在国际化办学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在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立足国际化和跨文化,创新现代学徒制,拓展跨国教育,以海外学生引进来培养的新方式,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新路径,共同打造中外共通、校企共长、学生共育的国际联合、校企联盟人才培养新模式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探索和深入。

《中国科学报》:回顾2017年,您最关注的高等教育事件或政策变化是什么?

谭天伟:今年高等教育界的“双一流”建设备受关注。“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在人才,很多高校使出浑身解数“挖人”,人才大战愈演愈烈。这个过程中,中西部高校人才的“东南飞”现象引起社会关注,教育部也明确表示“不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一方面,人才大战不仅给中西部高校带来了压力,同样给部分重点院校带来了压力,特别是人才引进过程中薪酬的不断“加码”,使得引进人才的待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出于收入差距考虑,普通教师的待遇也需要跟着提高,这又给高校带来了新的压力。

徐飞:2017年,人工智能已经或正在颠覆性地改变着许多行业和领域,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机智过人”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词语,如今最新的解读是,“机器的智力超过人类”。这不再是一句调侃的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在。

人的知识积累再多也无法与人工智能抗衡,从前教育的传统优势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思考,哪些事情是机器难以代替的,比如,创新力、想象力、好奇心、悟性、灵性等人类特有的东西,以及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中心主义”或“能力中心主义”会淡出教育。怎样把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发扬光大,这是教育需要正视的问题。与此同时,培养人的道德、情感、责任、情怀、审美、组织力、领导力等,也将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任务。

程备久:我最关注,也是最期待的就是党的十九大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安排。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理念和重点任务。这是每一所高校都应遵循的发展理念,都应追求的发展目标。

同时,我们对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感到振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补齐农村这块短板。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升级,需要强大的科技和人才支撑,赋予了农业高校新使命、新机遇和新挑战。在这方面,安徽农大从未停止过追求卓越的步伐。我们深刻认识“双一流”建设的制度安排

和目标导向,抢抓国家和地方“双一流”建设机遇,坚持拓展育人兴校、富民强农、校地协同的“大别山道路”,扎根江淮大地办大学,努力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办学育人实践中强化特色、争创一流。

陆靖:2017年我最关注的一个是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017年伊始我们着力推动“课程思政”改革试点工作,将其纳入学校重点课程建设,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开始全新的教育教学实践。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开设出综合素养课程、专业育人课程,思政教育转向了所有课程,所有教师都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同频共振的合力局面,初步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

另一个是2016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建设的通知》,在地方高校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支持100所左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特别是加强实习实训设施建设,打造一批位居全国前列、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双一流”建设的浪潮中,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一类本科高校,我们也在努力争创应用型高校的一流,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今年我们已经获批为博士建设单位,力争培养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一流应用型人才。

曹毓民:纵观2017年高等教育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大事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并且进一步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要求、路径和愿景。

这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职教育和高职院校将大有可为,这激励着我们在宏伟目标、伟大事业的征程中“撸起袖子加油干”。

谭天伟:如果对2017年作一个总结,对2018年作一个展望,可以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来概括。

过去的一年,我们牢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初心,积极推进学校改革发展,在一流团队建设、新工科建设、工程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台了一些措施,“一流学科”的建设方案也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很快就能出台。展望2018年,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专心谋发展、潜心办教育,静下心来思考教育,使学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更好地发展。

徐飞:2017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十九大召开。十九大有关高等教育的描述,明确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改革开放。今后的改革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未来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还要加大创新。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是如何做实做深改革、开放和创新。

程备久:即将过去的一年,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校院两级管理、人事管理分配制度“三大改革”,突出加强人才队伍、学科专业、平台基地“三大建设”,各项事业有了长足发展。2018年是学校建校90周年,我们将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办学实践,牢牢坚持“四个服务”的办学方向,聚焦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需求,建强人才库,升级创新源,打造“智囊团”,努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陆靖:2017年是教育热点多、教育改革大事多的一年,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党的十九大都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要求,指出了方向。根据这些文件和会议精神,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部署,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于应用技术大学,其内涵发展的重点包括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两个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坚持“本科水平、技术特长”的基础上,要培养更多适应新技术、新业态的更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在学科发展方面,要着重发展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学科,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科技”有17次,提到了8次“技术”,指出了高等教育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办学方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是我们国家创办的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以“应用技术”命名的公办本科高校。2018年乃至更长的将来,我们都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入学习报告精神,在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等方面作出努力,为支撑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美丽中国作出应有贡献。

叶高翔:2017年,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我校在立德树人和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例如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学风建设等;在学科和科研方面,新增5个硕士学位点和2个省级创新平台,横向项目回升,纵向重点项目增加;在社会服务方面,与安吉县合作取得进展,成立了中德校企合作联盟等。不过,我校的师资力量仍然较弱,人才引进和财务压力没有明显好转。

2018年,希望我校的财务状况有较大好转,进而在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引进、平台建设等方面,推动更大力度的新一轮改革。(本稿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王之乐、黄辛、见习记者许悦整理)

《中国科学报》:请您对2017年进行一个总结,并提出对2018年的希望。

“专业类国标”的全称是“普通高校毕业生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近日,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徐青森先生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92个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将很快公布。

在张大良先生担任高教司司长期间,笔者有幸受邀参加过两次高教司就“专业类国标”召开的征求意见会。在会议上,笔者建议教育部推出“专业类国标”需要格外慎重。徐青森先生在这次发布会上也指出,研制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首次”,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标准。“首次”二字却反而提醒我们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新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改革开放后更经历了快速发展,中外高等教育交流如此频繁和深入,如果“专业类国标”如此重要并且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为什么教育部不早早开始“如此重要”的工作呢?有没有可能,“专业类国标”的方向就是错误的呢?非常有

可能。第一个原因在于,“专业类国标”的逻辑源于工业生产逻辑。“质量标准”是工业产品生产、检验和评定质量的技术依据,包含从原材料进厂质量检验、产品生产流程控制、中间检验、产品销售等多环节的系统质量保证标准和管理规范。与此类似,“专业类国标”则对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标准、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能力要求在国家层面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但是,“育人”和“制器”本质上差别太大,这样简单的类比值得深究。

“育人”和“制器”差别在哪些方面呢?例如,袁隆平先生作为西南大学“农学”专业的毕业生,大学四年八个学期的平均成绩为(百分制):76.5,70.8,74.9,71.3,72.1,76.4,73.8,75.5,其四年综合排名在全班最后。假如以工业生产质量标准衡量,“袁隆平”几乎是不能出厂的产品。但几十年过去,袁隆平先生为国家和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几乎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未来,而那些考试成绩很高的“优质产品”与袁隆平先生相比,创造性贡献很小。这个“黑天鹅”案例所提出的问题,在工业生产逻辑下,越符合国标,产品质量越好;但在“育人”逻辑下,到底未来人才符合“专业类国标”好,还是不符合“专业类国标”好呢?

例如,朱恩涛先生1958年入读南开大学外文系,专业课成绩不错,但也不能说非常优秀,因为他大学毕业后想继续研究西方文学,但报考翻译大家于之琳的研究生落选。文艺青年毕业被分配到公安部,最后却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终身名誉副主席、中国警察协会副主席。这个“种豆得瓜”的情况与工业生产逻辑完全不同,但却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外语“专业类国标”如何会培养一个杰出的“警察”作为目标呢?我们本来计划生产一枚螺丝钉,但却生产出一棵树;或者更准确地说,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人会选择、会适应、会创造,这样的“人”反而是南开外语系的骄傲,是南开外语系和南开大学教学质量的代表。

第二个原因在于,“专业类国标”如果符合教育规律,应该能够解释世界一流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规律。我们可以初步尝试一下。牛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成就斐然。牛津大学本科有什么专业呢?“材料科学、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工程学、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心理学、哲学与语言学”专业这三个跨学科本科专业属于哪个“专业类”?牛津大学这三个专业的办学质量应该符合哪个“专业类国标”呢?

今年2月18日,高教司非常富有前瞻地提出了“新工科”概念。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30多所高校就“新工科”内涵、建设与发展路径进行讨论,达成“复旦共识”。会议还特别邀请了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托马士·肯尼。肯尼指出,工学专业类毕业生不需要理工科知识,他们要成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领袖,就需要去了解政治、哲学、历史和整个世界。认真审视斯坦福大学的新工科专业,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专业与以上崭新的教育理念相符合,其名称中甚至包含“+”这个中国本科专业名称中从未见过的符号,例如“计算机科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音乐”。这些专业属于哪个“专业类”?斯坦福大学这三个专业的办学质量应该符合哪个“专业类国标”呢?

可以看出,“新工科”的逻辑与“专业类国标”的逻辑本质相反。“新工科”要求专业的知识、课程组合具有极大灵活性,与学校教师的科研特色有机结合,与科学、人文领域的深刻认识有机结合,其知识组合方式带有极强的高校自身特性,难以被“专业类国标”规范,反而非常可能被国家教育部带有行政色彩的“专业类国标”牢牢地束缚。高教司创造性地提出“新工科”概念,又不得不执行“专业类国标”概念,恰似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在同时进行“左右互搏”。

“专业类国标”研制已久,教育部一直没有推出,这是谨慎和富有智慧的态度。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指出,“古希腊怀疑论者并不否认感觉和直接认识的真实性,但他们又声称,错误有一个全然不同的基础——它出自自我所下的判断。只要我避免去下结论,我就将永远不会受骗。”这就是怀疑论者不断要去悬搁(in suspensio)判断的原因,这是他决意要去悬搁的。“推出‘专业类国标’可能对高等教育发展、对创新人才培养造成较大阻碍,个人的建议是:应当以古老的智慧,将‘专业类国标’继续悬搁起来。”(作者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现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推出『专业类国标』需要格外谨慎

卢晓东